

我 的 一 生

奥古斯特·倍倍尔著

III

目 录

序 言	1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討論	5
非常法令頒布后接着发生的作用	17
党的第一批公开的生存征象	29
創辦非法的党报	36
李希特尔的年鉴	49
《社会民主党人报》	55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推广和紅色邮政局长	76
一八七九年的国会會議	84
一宗失去的遺產	87
同德国警察的斗争	90
关于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的集会說几句话	102
地下工作	105
一八八〇年的国会會議	114
維登代表大会及其前后	117
汉堡—阿尔托那及其近郊的小戒严	130
伦敦的卡諾沙之行	134
一八八一年国会的第一次會議	139
萊比錫及其近郊的小戒严	144
我的薩克森邦議会的选举	150
一八八一年秋季的国会普选	152

德累斯顿国会选举的一个余波	160
死耗的誤传	165
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二年在薩克森邦議會	168
一八八一年十月十日到二十一日最高法院的第一件 叛国案	173
意見分歧	177
苏黎世的八月會議	191
休息的日子	192
人名索引	197

序 言

5

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倍倍尔由苏黎世给我一封信，信里首先对我当时进行的笔战表示很感兴趣，随后接着说：

“我立了个遗嘱，希望你能同意，即如果我在《我的一生》第三卷完成前竟然去世，那末你可以就已准备好付印的稿子出版。我还要做的不多了，这一卷写到一八八二年就完了。往后可以快些进行了。

但要预先说定，稿子除文笔上的修改以外不能有其他变动。事实上只有发现我所举的事实是错误的，而我必须改正的时候，才可以有所变动。特别是，我所提到的还在世的人们的名字，只要我自己在原稿上没有略去或缩写，翻印时它们也应当不被略去或缩写。……因为我没有有意地错待任何人，而历史真实性也不容给涂上色彩，所以也没有理由把写好的东西加以改动。

这一卷若在我死前未能完成，我认为决不要由你或其他人来续写……

请把这信谨慎保存，以便作为证件。”

在这个嘱托之后，倍倍尔在信里又写到夏季的计划和家庭琐事，说他的情况是令人满意的，还谈到几个议会党团人物，随后用这话来结束这封信：

“我现在从事第三卷的写作，是逐段做到可以付印的程度并把其余的稿子附在后面。”

这封信的整个精神表示出，他还希望由他自己来完成他的回忆录，这是他非常关心的事，而他指定我为出版人，只是个预防措

6

施。就是七月二十九日他給我的下一封信，也十分关心于现代和当时由于議會党团对关税案的态度而引起的笔战。他所讲的同摩尔肯布尔在耶拿党代表大会上宣讀的那封信相仿。他虽然抱怨他的“无力工作”，但把这情形描写为“意欲进攻却在斗争面前被吓回来的怪现象”。他因无力战斗而愁悶，他把无力战斗同无力工作同等看待。战斗和工作在他有同样意义。但紧接着他在那封信里也提到第三卷的工作，这工作他只中断几个星期。对于我促使他注意一八七六年考查出来的事，他回答說：

“你所写的关于《柏林自由报》上的声明和攻击的事，我不知道，或者同許多其他事件一样，我全忘記了。我忘記了多少东西，我研究第三卷的有关文件时每天都体会到了。”

这是倍倍尔关于他的回忆录第三卷最后告訴我的话。这表示他正在从事完成他的工作。两个星期后，他就逝世了，离开了每个工作、每个斗争。他安安静靜地长眠了，未受到长时间对死搏斗的痛苦；这是永别的无限悲痛中的唯一安慰，这种悲痛使我們每个人感到抑郁，即使是沒有幸运同倍倍尔本人作朋友的人；只要是关心我們伟大事业因倍倍尔的死亡而失去了它最有力的和最忠誠的先鋒战士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倍倍尔遗留下来的写作材料一到我的手里，我立即开始执行我的亡友的遺囑。

我的工作，如倍倍尔所已指出，是不大的；基本上只是編輯的整理工作。文字上不够流暢的地方加以修整，同时也务求尽量保持作者的特色。引文和日期都尽可能与原件核对。送去付印的信件中有許多人的名字因簡便起見只写了开头的字母。凡是不言而喻的名字，我就把它的全称写出来。如果只是很有可能，則在脚注中注明原名。有少数几个名字，我不能确有把握来断定，所以只好仍旧只用开头字母。

自然，倍倍尔有意要諱用全名的地方，則仍用开头字母。

相反地，我却沒有仅仅暗示或完全隱諱一个完全写出的名字。

倍倍尔在这一点上的严格規定使我有点失措。看起来，他像是迫于毫无顾虑地热爱真理，不得不从事使許多有声望的同志陷于窘境的揭露。使我惊讶的是，我一点也未发見起了这种作用的东西。也許那些会使几个名字感到痛苦的实情，要到后面才提出，而現在却永远埋沒了。

我只把准备好付印的稿子拿来发表。倍倍尔搜集了超出这部著作的广泛的材料。书信、公文、剪报、摘要、传单和許多这类东西。材料直到一八九〇年，对于編党史的人提供許多有价值的指示。

我想在这里轉录一段給施吕特尔的信。这封信有关爱北斐特案件。我在文德尔的倍倍尔传的評論里曾提到，他好像把这案件和倍倍尔对此案的作用几乎忘記了。文德尔沒有提这个訟案。不过在后来的版本上他确乎补足了这个遺漏。虽然如此，讀一下在审讯期間倍倍尔自己在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一日所写的东西，也会感到兴趣的：

“案件是件空前未有的丑事，是检察署和警察局的耻辱。

他們不会梦想到，把我个人拉进公訴里去，就是为他們准备好了悲慘的失敗。检察官在第二天就已經暗地里說：这个人弄坏我的整个案件，往后还更要糟些。我希望案件对最大多数的被告都能一切順利。他們有一部分吃了本地的历史和他們对苏黎世以至伦敦的关系的亏了。

令人煩惱的是这将耗費大量時間。但是想到，如果我不在那里，被告們非常可能像羊似地遭人宰割，因為他們沒有掌握这类材料，那么，有所牺牲，我也是不后悔的。

我想，这是他們在德国上演的最后一次大規模秘密勾結的案件。”

这确是这类案件的最后一次。不久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就取消了。

同时我也发现一系列短短笔记，但这些笔记不过是以少数字句确定日期而已。个别部分没有说明，即使是零碎的说明也没有。除这里发表的稿子以外，我没有能发现任何可以作为倍倍尔的《回忆录》来发表的东西。要在这个准备好付印的稿子里加入任何东西，就会是此卷的续作，这是作者所不许的，也当然不许，因为所有这类的加添，哪怕是无可非议的，总不能认为是倍倍尔的回忆录。

我决不续加。但因为这个著作是骤然中断的，我只可以加上一个用以结束的后记。这里我发表几封倍倍尔同恩格斯的往来信件，时间是属于遗稿的最后部分的。

这样，我作为编者的工作并不很大。但是它所给我的享受却大得多，单就它允许我重温一道意味着我们党的英雄时代的那些时期来说，这享受就已经很大了。凡是能够参与那时期党工作的人，在记忆它时，没有不感到自豪的。年轻的一代却可以从对那些胜利的艰苦的考验的回忆中为他们面前的伟大斗争吸取勇气和力量。因为最艰苦的事情还在我们面前：夺取政权。

倍倍尔想在这个斗争中作我们的前导这个最热烈的希望不能实现了。但是我们伟大的先驱者的不朽的东西，继续生存在我们中间并将引导我们走向胜利和凯旋！

一九一四年一月。

卡·考茨基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討論

9

新选出的国会在王宫的白厅里开幕了。人們期待着，皇儲会来代替还在养伤的皇帝宣讀御前演說。但是既不見皇儲也不見首相到来。这项职务却由首相的代理人施透耳堡一維尼該罗德的奥托伯爵来执行。

这件事引起了热烈的公众議論。人們由此所得的結論是，皇儲不同意非常法令，因而拒絕为国会揭幕。而另一方面俾斯麦却又因皇儲拒絕揭幕而憤然不来，所以由其代理人荣膺此职。

在最高集团中的蛙鼠之爭总是有趣得很，但是事情并不因此而有所变更；因为非常法令草案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通过，这根据选举結果和大部分報紙的論調看来，已經毫無疑問了。

这議案胜过五月的那一个之处，在于它比那一个經過更彻底得多的加工。但是所持的理由却极不充分。議案中說，由于行刺事件和随之而来的許多侮辱君主罪行，联邦政府确信，在广大社会內充滿着蔑視一切道德教訓和法律条例的思想，这对国家和社会有巨大危险。所以有必要制定反对作为那个危险的代表者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法令。

接着是簡短而且很肤浅地描述一下自从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一八六三年）和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一八六四年）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这种貧乏的历史性叙述以后，接着是轉录国际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章程、爱森納赫綱領和哥达綱領以及一八七七年的根特宣言。国际章程中有这句话：

10

“第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宣布：这个国际工人协会和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們彼此間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和民族。”^①

这句美丽的无可爭辯而只有贊揚的話現在却用作实施一个非常法令的理由。接着又摘录了党在一八七六年和一八七七年哥达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那些都是公开的文件，每个从事于工人运动的人都知道。人們現在必須用这些辞句作为希望把社会民主党烧掉的火葬柴堆。

九月十六日在馮·傅尔肯貝克主持之下开始討論这議案。首相代理人的发言揭开了辯論之幕，他的发言內容非常簡陋，几乎用不了五分钟。首相沒有参加討論。国会多数派既有坚决意志为他取得一个如意法令，他又何必多費言詞呢？

議会的第一个发言人是中央党的代表，議員彼得·賴欣斯波格（欧尔貝）。那时候虽說文化斗争已被粉碎，可是中央党还觉得周身疼痛。一个非常法令，虽是对付它所痛恨的党的，它由結果看来，却也是可疑的。它的信徒到了自己也处在非常法令之下以后，还不了解这种态度。所以賴欣斯波格声明“暂时”反对通过和修改法令草案。

保守党的冒失鬼之一，議員馮·海尔多夫（伯第拉）却不这样。他干脆明显地表示拥护法令草案，还提出詢問說，单是非常法令是否就够了，是否宜于按这个意思来修改国会选举法，以保证更成熟的年龄和更长的定居期，并且是否适合把国会的立法期加以延长，以期鏟除政治生活中日益增加的不安。

他最后的心願在九年后如願以償了。

继海尔多夫之后，我作为党团的第一个发言人講話。党团一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十六頁。——譯者

致认为，要坚决反抗这个法令的全部和各个细节，为了这个目的给各种不同的内容指定了发言人。瓦尔特希和凯泽尔都未能参加辩论，他们那时候正在监狱里。

按照我那攻击是最好的掩护的原则，我以二小时的发言对议案和先发言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我首先叙述法令草案的来历，由此证明官方的陈述与真实情况有很多的矛盾。接着我攻击警察局的恣意胡为和在行刺期间法院残酷的判决，这些都属于德意志近代史上最悲惨和最可耻的事件，是德意志帝国的污点和耻辱。（呼喊守秩序。）随后我谈到党的历史。我指出了，俾斯麦在他一八六二年九月进入普鲁士内阁后立即企图通过他的代理人来影响运动，指出了他与拉萨尔进行谈判，指出了他的枢密参议洛塔尔·布赫尔努力拉卡尔·马克思做《国家通报》的撰稿人，指出了施韦泽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所充任的角色等等。这些事件清楚地表明，俾斯麦的动机决不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厌恶。宁可说他为一种愤恨所驱使，他恨党证明了他的那些计划都是行不通的，并且成为他的政策的最激烈的敌人，这促使他用按正理决不能加在我们身上的暗杀案作压制我们的非常法令的借口。

我继续说，但是用这个法令，却不能达到所追求的目的。社会民主党将在这个法令之下并且通过这个法令才正好获得信徒。对党的兴趣将会增长，失败者将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敌人。所以人们应该把这个法令草案丢到它应去的地方——字纸篓，在对我们的斗争中，不能依靠虚假的控告和空话，而要凭着事实和证据，而这是至今还没有被提出来的。 12

我继续阐述，我们将如何根据一切预料，在反社会党人法令之下为传播我们的思想而努力，而警察奈何我们不得，并且如何把禁书的传播范围扩大到以往所没有的程度。在将来会表明，这个法令是达不到它的目的的。

我的发言，如继我之后的发言人的讲话所证明，达到了所希望的作用，国内国外一切党派的报纸也都为此忙碌起来。继我发言的是普鲁士内政部长欧伦堡伯爵，他和他的同僚司透耳堡—维尼格罗特伯爵一样，讲话很短。他满足于由我的一篇著作中引证几句话，用以证明党是暴力颠覆者的一个信徒。此外，他否认社会民主党同政府代表之间有关系，或者只在党不是现在的党的时期有关系。他絕不知道有像我所叙述的那种协定或联系，在把他在各个细节上都能答辯的事实引证出来之前，他就必須最坚定地否认这些勾結企图。民族自由党議員班伯格博士却不这样，他在簡短发言中企图說明社会主义学說的危险性，但是也以不愉快的心情讲述，統治集团对于社会民主党并不是一貫持反对态度，这由俾斯麦对于拉薩尔的关系就可以证明。他說，至于我所說的那些話，一部分是人所共知，一部分却是新的。但是斯托克尔、托特牧师及其伙伴所創办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报》所代表的观点，是以我們为掩护，它所起的作用却更危险得多。他建議，設立一个由二十一人組成的委员会。这个法令需要深入和仔細地加以审查，因为我的发言使他深信，为了保护社会使之不受我向他們提示的危险，应
13 不惜任何努力。班伯格以往在巴黎作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政治亡命者，現在才由我的发言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第二天，俾斯麦出席，为的是对我进行辯駁。他請原諒他因健康关系一直未能出席會議。但他現在所以出席，是为了来反駁那种由我作喉舌所編排的故事，免得使这故事成为历史。俾斯麦反对我的讲话的实质，我在第一卷（参看第五十等頁）已叙述过。这里我請你們去参看。他在发言結尾时保证：他由我的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一八七一年五月）才認識到社会民主党的真实性质，并且从那时起成了我們坚决的敌人。他也一再尝试过，如議会所熟知，想通过立法措施把我們当作国家和社会的敌人加以取締，但是这

个他没有能在议会中得到贯彻。社会主义报纸曾威胁并高喊“给予警告”。“警告你们了。警告的是什么？却不是别的，而是虚无主义的刀子和诺比林的猎枪。是的，我的先生们，如果我们应该以这种方式生活在一个土匪社会的暴政之下，则任何生活都失去其价值。”（右派鼓掌）。现在是保护皇帝的时候了。“至于说在这种时候我们中间也许有几个人成为暗杀的牺牲品，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每个遭到这事的都会被人纪念，说他是为祖国的利益，为祖国的巨大利益而阵亡在光荣的战场上。”右派听了这句话之后爆发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抗议，我要求作议事规程的发言，因为首相侮辱我们，要求喊他守秩序。但是议长已经让那个保守党的老煽惑者冯·克莱斯特—瑞曹夫先生发言，这个人就以一个为他的阶级特权而斗争的普鲁士基督教正统派容克那种完全狂热的态度咒骂我们。他把我们在报纸上和集会中的整个活动都说成图谋叛国的行为。我们的歌成为战歌，我们的整个活动都是备战。我们夺去了人民的宗教，结果人民在今生就已经不仅要求同等权利，而且要求同等享受。他结束他的痛骂时，诉说广大群众的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忘恩负义和危害着基督教的道德堕落。 14

我现在作议事规程的发言，要求不仅对首相，也对诬蔑我们图谋叛国的冯·克莱斯特—瑞曹夫先生发出守秩序的警告。议长否认前面发言人的讲话有我所说意思。他必须对于每个干涉他的领导工作的尝试加以驳斥。

白拉克接着发言，与这个辩论所采取的激昂性质相反，他说得非常安详。对于内政部长和冯·克莱斯特—瑞曹夫先生从我们的著作中所引的话，他引用资产阶级作家著作中的话来回答，其中一部分来自文化斗争时代，其尖锐超过人们所能援引来反对我们的一切东西。对于班伯格的自由主义经济的理论，他用社会主义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理解来答复。他也声明，我们的敌人制定非常法

令并不能制服我們。

继白拉克之后，阿尔薩斯的厂主道尔夫斯发言，他設法证明，他們在米尔好森的所謂福利設備是一个对付社会民主党的密訣。但是还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失效之前，米尔好森就改由社会民主党人作他們国会中的代表了。继那个阿尔薩斯人之后的是一个波兰人发言，他亲身体驗到普魯士制定非常法是对付波兰人的。他激烈地反对这議案。这促使接着发言的馮·卡尔多尔夫先生更热心拥护这个法令。在欧仁·李希特尔一个較长的发言之后（他在发言中特別同首相取得諒解），就由多数派決議結束总辯論，因而我要答复首相的講話的发言被打消了。我只有在私人講話中反駁他那些針對我而发的謾言和謬論。

- 議會決議照班伯格的建議，把議案移交給二十一人委員會。
- 15 按說既然对于被告的党要有所決定，就應容納該党一个黨員參加这委員會，使它能夠發言和答辯，并作確有必要的更正，才是正理，也是議會的義務。議會中一部分人也有這種傾向。問我們黨團要選舉誰到委員會時，黨團建議選舉我。反對我的陰謀立即發動起來，所以我落選了。

在委員會中進行了熱烈辯論。民族自由黨左翼在拉斯克爾領導下又想做絕不可能的事。儘管是關於非常法的問題，他們却要設法尽可能來限制警察的任意胡為。他們想借此防止社會民主黨的所謂合法要求（即後來稱做我們努力的“正當核心”）受到法令的打擊。還有另外的在資產階級集團內與社會主義革新運動有連帶關係的努力也不要受到打擊。委員會右派的意見卻是相反，他們認為，人們必須做全部工作；必須剝奪社會民主黨以無害的形式進行它的有害企圖的任何可能性，於是就必須信任管理機關，不要弄不清楚的和模稜兩可的法律規定來掣它的肘。由於贊成一切緩和建議而反對這個議案者的幫助，拉斯克爾及其伙伴勝利了。當然，

經驗給予的教訓是，这个不彻底的決定只是一根不能限制管理机关的細綫；它們正是随心所欲地解釋法令。

由委員會，繼而由全體會議所通過的主要修改如次：法令草案中說，協會、各種聯合、以及合作金庫、集會、印刷品、募捐，一旦發覺是為破壞現有國家秩序或社會秩序而努力的，就應禁止或鎮壓。按委員會以至全體會議的決議，這句話如下，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或是共產主義的顛覆現有的國家秩序或社會秩序的企圖，一旦顯示出危害治安，特別是危害各階級人民的和睦時，就應加以禁止或鎮壓。¹⁶

一個字眼上的爭執。鰻魚是炒着吃或者燉着吃，對它是無關輕重的。

此外，根據草案，應設立一個七人的常務委員會，由聯邦議會內部推選，凡對下級各機關所判決的處分有不服的，可向該委員會提起最後的上訴。委員會和國會決定，設立一個九人委員會，由聯邦議會內部推選四人。其他五人由帝國的或各個邦的最高法院人員中按人數分擔。國會相信，由此可以取得較大的保證，使人不至於太粗魯地解釋這個條例。而實踐證明，它在这里又錯了。這個申訴委員會的判決却是這樣的反動，以致我們一八八〇年在萊比錫黨領導機關里決議，因為沒有用處，今後不再向它提出任何申訴。

草案第二〇條，即後來法令的第二八條，是關於所謂小戒嚴的規定，在一個地區里如果社會主義的活動企圖威脅了治安，則所有的集會都須報請警察廳批准。委員會和國會決議，國會或者邦議會的選舉集會不受這個規定的限制。漢堡市政府却規避了這個規定，它根據地方法令的規定，連這樣的集會也禁止了。所以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整個有效期間，除開一八九〇年二月的國會選舉時期（當時業已確定該法令到九月底就要取消了），社會民主黨在那里沒有舉行過一次選舉集會。漢堡市政府這種手段對它毫無益

处；因为在法令統治之下，三个选区全部落于社会民主党之手，并为它所保有。

第二〇条即相当于第二八条的另一个修改（也是一个改善）是这样的，凡是根据所說的这一条发出的指示，必須立即或酌在下次
17 會議上向国会說明它发布指示的理由。通过这个決議固然从沒有阻擋住小戒严的宣布，但使我們有可能，年复一年地在談論这样措施时来批判执行法令的情形。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辯論因此成为照例的事情。

草案的第二次討論开始于十月九日的全体會議。中央党由其領袖口头声明，它将投票反对法令草案。声明中說，它虽然是社会民主党的坚决敌人，也不能贊成这样一个非常法令，这个法令使国民的权利保障发生問題，把所排斥的和允許的企图都一概打击了，并且用警察的揣測代替了法庭的判決。一个普通法令，面对着国内日益增加的危險，是可以要要的，它在有关出版、結社和集会的越規行为方面可作刑法的补充。也期望現在采取积极措施，借以消除經濟和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工人階級生活中确实存在的而且传布很广的不良状况，“以便使正义、敬神和和平，特別也是国家一教会方面的和平，在帝国取得完全的統治地位”。

根本說来，中央党所要的，比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提供給它的还要多些；它要法令普遍严厉化，要普遍反动。

拥护議案的第一个发言人是議員馬歇爾·馮·比貝施太因男爵，他后来是外事局局长，末后是駐君士坦丁堡和伦敦的公使。馬歇爾，一个魁梧威严的人物，那时候是曼海姆的檢察官，他在那里也曾一再充当控訴我党同志的公訴人，被控者中間有弗兰茨·約瑟夫·艾尔哈特。这次公訴引起了一个有趣的插曲。艾尔哈特的被控是因为他曾撰拟一个公告，向曼海姆选区的选民推荐我为曼海姆的黨員候选人，說我是个孚众望的人，因为爭取人民自由和人

民权利而被判要塞监禁二年。这是关于一八七七年一月的国会选举。馮·馬歇尔先生以检察官的身份把这个說法看成是一种歪曲事实，由于这种歪曲事实，上級的命令遭到了昧着良心的蔑視。他根据德意志帝国刑法第一三一条控告艾尔哈特，并建議把这个血气方刚的罪犯判处徒刑以示儆戒。至于我，則并不是因为我为爭取政治自由，而是因为图謀叛国才被判罪。首席法官已經要就此結束审讯，这时艾尔哈特請求发言，說他虽是被告却也有几句话要說。他得到发言机会，在那簡短的、用最純粹的普法尔茨方言所作的答辯里是用这句话来結束的：“我的法官先生，您們不要相信上面坐的那个人（检察官），他会把小虱子說成一个大象。”馬歇尔赶快抓起报纸遮在面前，免得被人看到笑容。但是法庭相信检察官，把艾尔哈特送进監獄三个月。他后来的态度同刑法对他起了教育作用的說法相反。 18

馮·馬歇尔先生和他那些同党的煽动家相反，是一个溫和分子。他贊成人們很可以达到預期目的的短期的法令。继他之后发言的是宗納曼，他声明反对这法令。俾斯麦还在一八六六年战争时期与宗納曼不睦，对他作了回答。

我怀疑俾斯麦个人对誰怀恨更深，是对欧仁·李希特尔还是对宗納曼。我相信是对宗納曼，因为欧仁·李希特尔，尽管他的一切反抗，总还是个好普魯士人，但他痛恨宗納曼这个南德意志的反对普魯士的人，这个“共和主义者”，他认为他的机关报《法兰克福报》对法兰西共和国較之对德意志帝国更同情。所以才有在一八八四年国会选举，宗納曼同我們的候选人沙保尔进入复选，法兰克福的民族自由党向俾斯麦請示应该选举誰的时候，他叫人回答說：“侯爵願要沙保尔。”于是沙保尔当选了。

俾斯麦有一种习惯，他一旦怀着斗志（他上述的那一天就有这种战斗情緒），很少固定在当前所討論的問題上。他为宣泄胸中的

19 憤慨，他会从这一事件跳到另一事件，向擋他路的敌人猛攻。議長时常弄得无可奈何，既不敢打断他的話，而又不便阻止被攻击者的自卫，因而使辯論扯得远远超出本題范围。这次也是如此。

他同宗納曼爭吵以后，又向我們猛攻。先前曾以法国为社会主义的試驗場；巴黎公社被打倒后德国成了試驗場。随后他抱怨說：德国人是天生的批評家，他們以誹謗官厅和制度为乐事。这話特別适用于进步党，它在各大城市為我們掘松土地；它是“社会民主党的早熟果实”。接着他又重新攻击我們，譴責我們的鼓动方式和我們把群众誘进圈套的手段。接着，他抱怨我們刑法的溫和、法官的慈善、迁徙自由、大城市的娱乐对群众的誘惑。他的发言是个发自容克及其伙伴心灵深处的哀歌。但是这个发言絲毫沒有政治家对于資產階級世界的本质和活动的了解，而資產階級世界的本质和活动却是他所抱怨的一切和使社会民主党成为他必須顾到的社会生活一个必然現象的根源所在。

他继而抱怨資產階級各党派的分裂，抱怨資產階級党派方面缺乏信任和迁就。他在結束发言时要求結成各部分互相信任的紧密队伍，以便使帝国經得起一切风暴，并能有效地抵抗风暴。这些要求，根据俾斯麦自己在各党派互相斗法之中和在这次发言中为达到他的目的而努力的結果看来，对于議會却是要求过奢。他的話結束时沒有任何喝采的表示。

次日，哈賽尔曼得到机会来答复俾斯麦的攻击和挑撥。他在他的大部分发言中做得确是巧妙。但在結束时他自己却陷于挑畔。对于俾斯麦前一次攻击我的发言，哈賽尔曼答复他說：我們不
20 磨匕首来对付俾斯麦侯爵，我們鄙視用匕首从背后刺人；我們如果战斗，我們就面对面地战斗，但是如果有人鑄彈磨刀来对付我們，那么我們也要說：“如果我們應該生活在上述这样的一个土匪社会的暴政之下……”于是会场中起了騷动。議長因为所謂挑起吵鬧